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与中国社会发展

王海亭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西南林业大学思政部,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尽管由于日军的侵略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在经过内迁之后, 中国的高教事业仍得以保存、恢复和发展。本文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 论述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长远、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抗战时期; 高校内迁; 中国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0-0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 (2014) 04-0173-04

作者简介: 王海亭,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西南林业大学思政部讲师。

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国民政府的决策

(一)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过程和特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 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其后, 日军对中国东部沿海展开疯狂的轰炸与进攻, 使我国东部地区高等院校遭受空前浩劫。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 战争爆发前, 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①, 但“至本年(1938年)8月底止, 此一百零八校中受敌人破坏者, 共九十一校, 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十校”。^②在我国高校大部分被破坏的形势下, 国民政府被迫作出高校内迁的决定。1937年8月, 国民政府颁布《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 规定战区各校“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 量予迁移, 其方式得以各高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它校”。^③至此, 中国史无前例的高校内迁正式开始。

八年抗战期间, 高校内迁始终没有停止过, 其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迁移。第一次迁移自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8年武汉、广州陷落, 前后约一年半时间。这一时期内迁高校总计约75所, 占1938年底我国高校总数97所^④的77%, 占到整个抗战时期内迁高校总数124所的60%。国民政府疲于战事, 仅对国立重点大学的迁置作了指示和安排, 并选定适当地点组建临时大学, 共分三区: 第一区在长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划入该区, 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第二区在西安。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划入该区, 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第三区待定。这次迁移是三次大内迁中规模最大、任务最繁重的一次。三次迁移的规模, 较之于第一次要小一些。第二次迁移,

始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截止1942年上半年, 迁移的大多是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 迁移的高校总计约21所。第三次迁移是1944年2月到12月。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退, 使战时陪都重庆震动。原迁至广西、贵州和粤北、湘西等地的大批高校仓促迁往四川、黔北和粤东北等地, 迁移高校总计21所。

综观八年抗战中高校的内迁, 基本集中在以下四个地区^⑤: 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地区; 以广西、湘西、湘南、粤西、粤北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南部山区; 以赣中、赣南、浙西、浙南、闽中、闽西等为中心的华东南部丘陵地区; 以陕南、关中、陇东为中心的西北地区。需要说明的是, 整个抗战期间,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迁移之外, 小规模 and 个别的迁移则更多。

(二) 国民政府的高校内迁决策原因分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个月, 即1937年8月, 国民政府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 标志着高校内迁决策基本形成。国民政府之所以很快就作出了高校内迁的决定, 一方面与当时的战时情势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抗战初期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论争和国民政府的决策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形势自不必说, 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论争却由来已久。早在抗战初期, 素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就围绕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国统区教育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 共有四个持不同观点的派别。第一派是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陈立夫认为“教育之任务, 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

……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①。第二派为“战教派”，他们认为，为适应抗战之需要，应弃原制，实施战时教育。第三种观点是对“维持现状派”和“战教派”的折衷，即“标本兼治派”。他们认为战时教育应该包括“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第四派是以李公朴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认为应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体系。李公朴对怎样实施战时高教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其一，要“中国化”；其二，要“实用化”；其三，要“革命化”。^②

随着论争的深入，旧教育弊端日益暴露，要求战时教育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政府害怕因这场争论而引发的教育改革呼声会危及其统治，遂决定采用高压政策来结束这场纷争。1939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训词”指出，“关于这一问题（即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问题），我个人的意思是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了基本”。^③蒋介石“训词”的发表，使“维持现状派”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随后，教育部决定以“战时需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确立了“维持学校系统正常运转，并对平时教育措施作最大弹性调整”的政策。

另外，只要稍加分析国民政府的决策心理，我们就会对这一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国民政府自1928年定都南京后，俨然以正统自居，至抗战爆发十余年来，业已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这与其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策略有关。在国内，国民政府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最大对手，早就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影响其战时教育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在国际事务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一再退让，这是一种“忍让和戎”的心理定势在作怪。这在蒋氏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的《敌乎？友乎？》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国民政府一直注重将教育改进成完全符合自己旨意的统治工具，企图借助教育的建设带动整个巩固政权基础的建设。据此，国民政府制定“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就不难理解了。

二、日本侵略给中国高等教育造成的损失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制定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中，日本把对中国教育的破坏放在重要的地位，而高等院校又是重中之重。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的“各级学校均为反日集团，所有知识青年均系危险分子”。^④“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接连对中国高校进行蓄意摧毁，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一）物质损失

1937年7月29日，日军连续轰炸天津达4个小时，南开大学被夷为平地。在其后的两个月中，被炸院校有复旦、同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截至1938年8月底，我国108

所高校中被破坏者共91所。“在战争爆发前，教育教员共七千五百六十人，职员共四千二百五十人，学生共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战事发生后，受影响之教职员共计二千人，学生共二万余人，已达全数百分之五十”。“我国高等教育机关之损失，就其可知者而言，已达三千三百六十余万元之巨数”。^⑤在此，笔者仅以几个战区国立大学所遭受的损失为代表来说明抗战时期我国高校遭受损失之严重（如下表示）。

校名	死伤人数及 不知下落者	财产损失 (法币元)	备注
中央大学	6	383,400	内有2,330,600元系全部校舍不动产，因全部沦陷，故已视同损失；死伤系建筑工人
北京大学		600,000	此系校具、图书、仪器被毁数，校址被占未作估计
清华大学		6,050,000	校址房舍约3,500,000元，图书设备约2,500,000元，长沙校舍被炸50,000元
山东大学		3,611,663	青岛房产2,912,580元，校具仪器约223,735元，图书181,764元，济南农学院校产约287,584元
中山大学	12	20,000	死学生1人，伤员5人，工友5人，失踪生1人
浙江大学		1,560,000	校舍约1,300,000元，图书仪器及其它设备约260,000元
湖南大学	30	700,000	死学生2人，工友1人，伤员生20余人，
厦门大学		1,288,202	建筑物地产约972,700元，图书仪器80,907元，机器校具古物计189,595元
合计	48	14,213,265	

注：本表材料截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8月底止。

数据来源：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

由表可见，仅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短短的一年时间内，我国东部许多著名高校损失非常惨重。如清华大学校舍损失约合350万元法币，加上图书设备损失和迁长沙后校舍被炸毁，损失共达60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损失只是高校内迁中第一次所遭受之损失。而在第二、三次大规模迁移中所受的损失，也非常惨重。

除了可估量的损失外，尚有许多不可估量之损失。如许多大学中关于中国各方面所收集之材料，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关于中国近代史档案之搜集，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足珍贵之物，今后亦无重新收集之可能。“此项之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⑥

（二）精神损失

日军的侵略还对内迁高校广大师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首先，在生命安全上，广大师生承受着巨大的担心和恐惧。他们头顶烈日，脚踏险水，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躲避日机的轰炸和扫射。如1938年11月，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西迁昆明。师生们共行走3500公里，耗时68天，历尽险阻。到达目的地时，闻一多的胡子已有近尺长，化学家曾昭伦身上长满了虱子。当时与此情形相同甚至更为艰苦的搬迁不在少数。浙江大学两年间共进行了25次大搬迁，途经浙、赣、湘、桂、黔5个省，行程50,000多里。在此意义上，高校内迁不啻为中国文化教育界的“长征”。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

中，迁校4次以上的高校约19所，而迁校二、三次的则占绝大多数。^①

其次，广大师生还在心理上倍受煎熬。1939年全国教育会议之后，内迁高校更多受到的是党团的限制。众所周知，当时中国很多大学教授受欧美民主思想感染颇深，要他们声称负着“党国使命”，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心理折磨！这一时期，难以适应的教授被迫离职的很多。朱光潜、张家元等十余教授，据说就是被迫离开四川大学的。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因不能迎合当局“以党治校”的方式，亦不得不被迫离职。用时人的一句话说：今天的大学教授和学生同样失去了“人的自由”！^②另据资料显示，当时内迁西南联大的学生曾有过一段时间精神上的“消沉”：

社会上对于他们（从北方来的青年学生）的烦言很多，曾有人把联大学生分成三种：上焉者，埋头伏案，除了关心警报和物价以外，什么事都不管；中焉者，泡茶馆，打扑克，看电影，陪爱人，想尽各种方式，以遣此苦闷人生；下焉者，酒色财气无所不为。云南边疆问题专家陈碧云曾为昆明学生的腐化、颓废、消沉而叹息不已。^③

因为高校内迁到的地方基本上是偏远山区，那里的环境较之抗战前方未免太过沉重，加上国民党的“以党治校”、校舍的简陋、资料的贫乏，满腹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一时之间产生消沉的心情，亦是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却实实在在是对青年学生精神上的伤害。

尽管高校内迁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内迁高校广大师生仍怀着“抗战兴学”、“兴学救国”的宏伟理想。在国民政府和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以保全和延续。广大师生的爱国精神，可歌可泣！

三、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中，高等教育既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又是终身教育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它既是知识的保管者，又是知识的创造者”。而“大学对整个社会发展所负的责任，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突出”。^④从这个角度来看，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长远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在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损失。

（一）有助于抗战的胜利和战后社会的发展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不但使日军摧毁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图谋濒于破产，而且有助于抗战的顺利进行。内迁高校广大师生在工作和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到抗战中来，这主要表现在宣传、捐献、护理和参战四个方面。“七·七事变”后，各内迁高校师生自觉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抗战。如内迁云南徽江后，中山大学师生在县府门口的空房里设立了书报室，在街头和校门口开办宣传栏，以诗歌、漫画、杂文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之宣传；河南大学学生自编了《救亡三字经》，深入农村，向农民教唱抗日歌曲，以此提高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在捐献方

面，广大师生或直接捐献自己手中的财物，或组织义卖、义演等，以其收入用作捐献。如迁避香港的岭南大学，全校仅六、七百人，仅1939年冬，一次就“捐款万元”^⑤。护理方面，内迁高校师生亦有参加。如东北大学师生在1937年10月组织慰劳队、看护队，逐日轮流服务，看护从前线运抵西安的两千余名受伤官兵。与此同时，内迁高校广大师生还踊跃奔赴抗日前线。据统计，抗战期间被征调的高校生即达3600余人，至于自动参战者，其数就更为庞大。内迁高校师生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日斗争，是教育界对民族抗日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谱写了学界抗日的辉煌篇章。

与此同时，高校内迁对战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1945年第一学期，我国已有高校140所，学生共83,000余人^⑥。而这些学生大部分在解放战争期间都发挥了自身的积极作用，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的民主斗争行列。“他们（学生）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斯时重建的工作将对全国的才俊责以重任，似此情景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国的经验充分昭告世人。”^⑦

（二）加速了中国高教事业的现代化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在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自身得以保存和延续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高教事业的发展，有利于高教事业的现代化。

第一，抗战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虽然损失严重，但经过高校内迁，其整体的发展并未被阻止。在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内迁高校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以1940年为转折点，其后的数年间，中国高校不仅招生困难的现象已成为历史，在校学生总数、毕业学生的总数和教职员工的总数，也呈直线上升趋势。如表所示：

抗战期间全国高等教育发展概况表^⑧

学年度	高校数	学生数	毕业生数	教师数	职员数	岁出经费(法币元)
1936	108	41,922	9,154	7,560	4,290	39,275,386
1937	91	31,188	5,137	5,657	2,966	30,431,556
1938	97	36,180	5,085	6,079	3,222	31,125,068
1939	101	44,422	5,622	6,514	4,170	37,348,870
1940	113	52,376	7,710	7,598	5,230	58,296,680
1941	129	59,457	8,035	8,666	6,503	91,196,550
1942	132	64,094	9,056	9,421	7,192	196,976,900
1943	133	73,669	10,514	10,536	7,064	419,852,372
1944	145	78,909	12,078	11,201	7,414	1869,869,039
1945	141	80,646	24,200	10,901	7,193	(缺)

由于高校内迁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基础，到1947年，我国专科学校已达到207所，几乎是战前总数的2倍。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学生数已超过15万5千余人^⑨。可见，高校内迁不但保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不为战争所中断，

而且使我国的高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高校内迁改善了我国高等教育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使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空前繁荣，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进程。抗战爆发前，我国高校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各地，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寥若晨星。据统计，高校内迁前，湖南以西（不含西藏、宁夏）的10个省区，即陕、甘、新、川、康、滇、青、云、贵、湘，总计专科以上学校在10所左右，且学术水平普遍偏低。而此时，仅北平就有高校14所，上海则更高达25所。中、西部地区高教事业之落后，由此可见一斑。但自高校大批内迁后，这一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抗战胜利后，原内迁的著名大学虽已回迁，但抗战期间新设立的大、专院校都留在了原地。到1947年，四川拥有大、专院校14所，陕西省也有6所高校，其他如云南、贵州、甘肃等省亦均有了专科以上的学校。从此，我国高等院校分布开始趋于平衡。

第三，高校内迁对我国的高教制度也有所创新。如学校组织的厘定，课程的整理，师资的审查，学术研究的提倡，师范学院的创立，著作发明的奖励等，都在八年抗战中臻于完善，并形成了法规。仅著作发明的奖励，到1945年共举办了四次，获奖者共199人^⑤。正是因为国民政府的提倡，抗战期间，我国技术发明成绩十分显著。“1938年到1944年间，专利注册即达431件，种类和性质已转移到以机电产品、交通工具和化工的发明更新为主”。所有这些制度的创立，都为战后我国高教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基础。

（三）促进了中国社会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高校内迁也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趋于平衡。

首先，内迁高校活跃了内迁地区的政治气氛，给广大内迁地区灌注了新的革命力量。如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继承爱国民主传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一次又一次掀起民主运动的高潮，并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激发群众向反动势力斗争，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使联大成为爱国的民主堡垒。”^④

其次，内迁高校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内迁高校传播了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开启了落后地区的民智、民风，推动了中、西部社会近代化进程。如同济大学迁至四川宜宾时，还曾用直流发电机为当地群众发电照明^⑥。浙江大学在遵义和湘潭，先后进行了土豆、番茄的种植推广和黔北虫害防治等^⑦。这些都冲击了当地的保守风气，直观形象的传播了现代科技知识，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最后，高校内迁还促进了内地教育事业的完善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充实师资和新建中学数量上。

如北平师范大学在内迁八年时间内，为西北地区中、小学师资队伍共培养出1300余人。在新建中、小学的数量上，以四川为例，到1945年中等学校增加到1,671所，达到战前的三倍，小学到1944年已发展到47,341所，超过1937年的2至3倍。韦卓民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内地并不是一种灾难。他们是迁移到了文化落后的地区。知识和技术意念的普及帮助了内地的迅速现代化。”^⑧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有着毋庸置疑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保证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才资本，对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中国社会自身结构平衡、健康、长远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这次高校内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客观社会效应要远远大于当时所遭受到的损失。我们在揭露、谴责日军的暴行同时，更应铭记先辈们虽遭劫难，弦颂不绝的奋斗精神。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2] 王桧林. 中国现代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 [3] 魏宏运. 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 [4] 董驹翔. 社会学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 [5] 郑登云. 中国高等教育史 [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4.
- [6] 肖效钦等. 抗日战争文化史 (1937~1945)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 [7]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8] 国民政府教育部.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Z]. 商务印书馆, 1948.
- [9]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28).
- [10] 战时教育论 [M]. 独立出版社, 1938.
- [11] 郑登云. 中国高等教育史 [M].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4.
- [12] 徐国利.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 [J]. 天津大学学报, 1996, (1).
- [13] 陈立夫. 告全国学生书 [J]. 教育通讯 (创刊号), 1938.
- [14] 李公朴. 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M]. 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
- [15] 杜元载. 革命文献 (第58辑) [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 [16]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7] 季啸风. 中国高等学校变迁 [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18]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J].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
- [19] 岭南大学. 抗战以来的岭南大学 [J]. 教育杂志 (第31卷), (1).
- [20] 韦卓民学术论著选 [M]. 华中大学出版社, 1997.
- [21] 余子侠.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J]. 近代史研究, 1995.
- [22] 侯德础. 论抗战时期的川省工业 [M].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5.
- [23] 吴宝璋, 等. 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集 [C]. 云南师范大学报编辑部.
- [24] 翁智远, 等. 同济大学史 (第1卷) [M].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1.
- [25]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委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M].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李保林)